

A8【东张西望】从“中国最能打的女人”说综合格斗

A8【关注】2019 诺贝尔奖“热点”解读

A9【真实记录】在废弃矿坑里寻找美

十三行荷兰馆 将荷兰豆引入广州

撰文/供图 蔡鸿生

06 有趣的洋人寻洋狗



荷兰馆著名大班范罢

荷兰馆是荷兰东印度公司1727年(雍正五年)在广州设立的商馆,专营丝、茶、瓷等。这家十三行中的老字号,不仅生意兴隆,对清代中荷外交、文化交流等也有重大影响。下面我们讲讲发生在荷兰馆内外的故事——

01 著名诗人屈大均登上荷兰船参观

1601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九年冬,范·纳克率领的荷兰船队来粤要求通商,虽未成功,却从此在岭南留下了“红毛夷”之名。

1602年,荷兰东印度公司正式创建,从国会取得在好望角以东至麦哲伦海峡一带的贸易专利权后,“红毛船”日益频繁地出现于南中国海。因此,清初的广州人,对来自荷兰的海船和洋商并不陌生。

明末清初著名诗人屈大均(1630-1696)在五言长歌《镇海楼》中写下:“红毛知荷兰”的明确诗句。他还亲身登临过荷兰船,目睹种种“红毛”风尚,在《广东新语》对清初荷兰商人的饮食、起居和礼节,画出一个轮廓,如饮水过凉、卧软床、戴皮手套、吃烤面包和弹琴跳舞等等。

在清朝的“夷务”管理体制中,荷兰属于经广州入华的“粤道贡国”之一,难免要与羊城结下不解之缘。顺治十二年(1655)荷兰总督(荷兰驻印尼总督)派遣的第一个使团经广州赴北京,未能达到直接通商的目的,只取得微小的进展,据梁廷枏《粤道贡国说》所记:“昔八年来朝,员役不过百人,止令二人到京。所携货物,在馆(北京会同馆)交易不得于广东海上私自贩卖。”

02 清代诗文中的荷兰馆

“荷兰”,在明清时代有各种译名——荷兰、和兰、阿兰陀、尼特兰,等等。直至乾隆五十九年(1794),奉旨将“贺(有口字旁)兰(有口字旁)国改写荷兰国”,这个译名的书写才规范化了。

乾隆之际的江西临川举人兼诗人乐钧游粤期间创作组诗《岭南乐府》,内有《十三行》专章,记“荷兰”事如下:

“粤东十三家洋行,家家金珠斗星。楼窗幔镜重洋长,楼窗幔镜重洋长。荷兰吕宋英吉利,其人深目而高鼻。织皮卉履竟珍异,海上每岁占风至。”

十三家洋行又称“十三夷馆”(馆址是广州行商的物业,租给洋商作棧房),位于广州城西,面临珠江,并排而立。所谓“楼窗幔镜重洋长”,即馆前各树一帜,标明国籍。与英吉利馆毗邻的荷兰馆,树“红白蓝”三色旗。荷兰馆的馆址属中国行商“义丰行”承租,每年租金约六百两。

荷兰馆作为广州“舶市”的一家老字号,早在乾隆年间已为人所熟知,并被文人骚客吟咏不绝。曾任广东始兴、海阳(潮安)知县张九铨,于乾隆三十五年(1770)作《番行篇》,以荷兰馆为中心,详记当年广州的洋人洋事,是一首罕为人知的长歌,计七言七十八句。前面五十六句是实质性的描述,后面是感时伤事,新意无多。下面我们白话来表述一下诗句要点。诗句中所谓“别起危楼瞭镜窗”,指番行是仿照澳门的洋楼式样建造的。“迎来船主不知名”,指荷兰船主。荷兰馆用黑人守门,故称“黑水龙奴荷德”。行商是中荷贸易的经纪人,用诗的语言表述就是,“居中驱俗公行大”。

此外,莲花钟、百宝表和玻璃、风琴,等等,均为番行室

康熙二十四年(1685),粤海设关,经清廷议准:“荷兰国进贡之期,原定八年一次,今该国王感被皇仁更请定期(缩短周期),应五年一次。”只是改变了“贡期”,并未建立起经常性的通商关系。

直到1727年(雍正五年),荷兰人才得准在广州设立一个商馆——荷兰馆。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因此进入新的发展时期,相关研究显示:“由17世纪至18世纪初叶,荷兰东印度公司主要对巴达维亚(现时印尼的雅加达)为基地来经营欧亚间的华茶贸易。”

到了1728年12月5日,该公司更自本国直接派船前往广州购买茶叶及其他货物。船中载银三十万盾,交易完毕,于1730年7月13日返抵荷兰,运回茶叶、丝绸及瓷器等物,获得净利为投资的一倍有余。自1731年至1735年,又有十一艘荷船往广州贸易。自1739年(乾隆四年)开始,华茶成为荷船自东方运返欧洲的价值最大的商品。

清代广州的荷兰馆,是专门贩运茶、丝、瓷等外销货物的商馆,又名“集义行”,其经商宗旨是十分明显的。不过,作为清代前期荷兰驻华的唯一机构,它在外交事务和文化交流中起着独特的作用。

内的特有新奇陈设,难怪张九铨要郑重其事地如数家珍了。红毛船抵黄埔港后,如何纳料、卸货、成交,以及在公行保商(即公行)操作下采购回航商品湖州丝(浙江的丝绸)、江西瓷、福建茶,几乎都点滴不漏地入诗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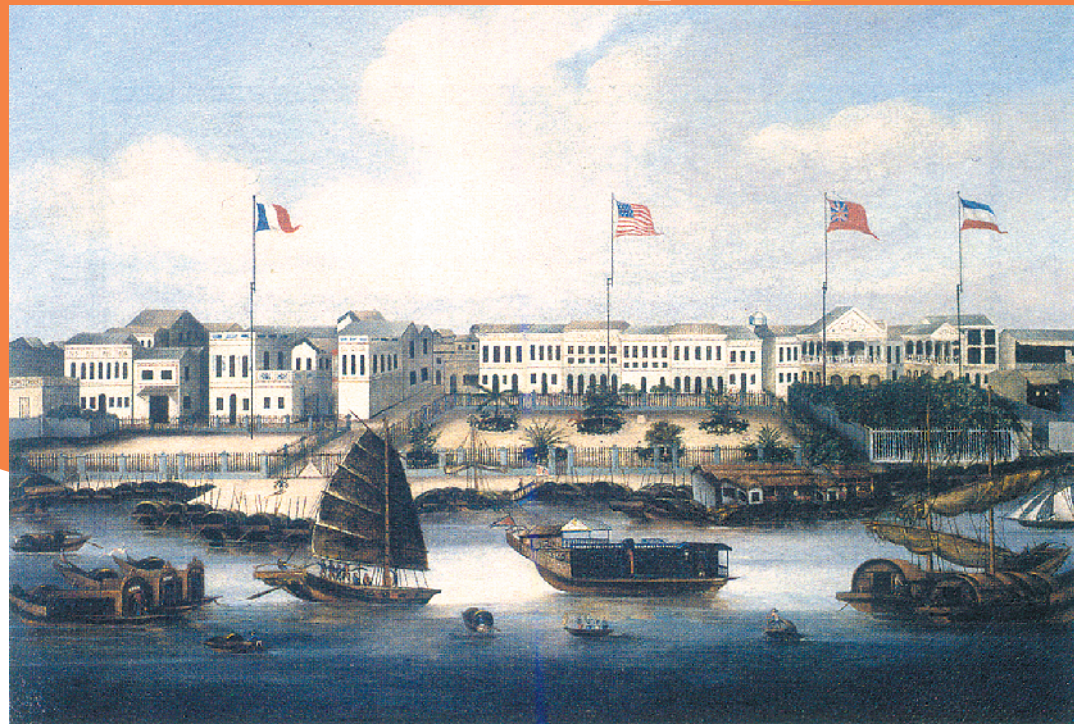
《番行篇》关于舶市、舶主和舶商的介绍,较同时代的官方文书留下了更具体的荷兰馆情事,是弥足珍贵的。

山东嘉祥举人曾七如的《南中行旅记》,是乾隆四十七年(1782)五月十三日直接采访所得,堪称有清一代关于广州荷兰馆的权威报道。

曾七如在一位姓许的翻译陪同下,从广州城的八门之一“归德门”出城,来到十三行馆区访问荷兰馆,受到馆主即“粤大班”的热情款待。荷兰馆门外,守护者为碧眼卷发的西洋人,手持佛郎机(枪械)。馆内陈设一派西洋情调:红地毯、水晶灯、自鸣钟、望远镜;墙上挂着《海洋全图》;植花养鸟,有贝多罗花、丁香藤、相思鸟、五色鹦鹉。此外,还备有大小西洋犬和小哈巴狗。

嗅定之后,先吸鼻烟,即“嗅之辛香不可耐”的金盒烟。随后荷商设饗宴,席上的餐具,均为广彩景德瓷,“金碧辉映,五彩绚烂”,可知是订制的特等瓷。端上的肉是块状的,以“铁牙”当筷子切着吃,还配有葡萄酒。曾七如连饮三杯,馆主赞他好酒量。对举人出身的曾七如来说,这已经是大开眼界了。

应特别指出的是,文中的所谓“大贾”,实即荷兰馆大班(“大班”即贸易代表,第一大班俗称“总班”,荷兰馆的馆主用黑人守门,故称“黑水龙奴荷德”)。行商是中荷贸易的经纪人,用诗的语言表述就是,“居中驱俗公行大”。



荷兰国旗、英国国旗、美国国旗、法国国旗、清初中国画家画的《广州十三行》,从右数起,分别是

03 将记述中国之行的书奉献给乔治·华盛顿

广州荷兰馆的历任大班,其名远不及英国留粤大班那样显赫,但有一位因参与对华外交事务而名垂史册,其人其事,独具一格,他就是乾隆五十六年(1791)至乾隆五十九年连任大班的范罢。

范罢 1739年11月1日生于荷兰乌得勒支省,先是随东印度公司货船到澳门和广州经商八年(后来他加入美国籍,成为双重国籍的海商),之后于1790年(乾隆五十五年)任职于荷兰馆。按个人气质而言,范罢具有开拓型的品格,被人称赞为:“其人大有趣味,活泼、谨慎、多智、善于应变……渴求新知。”

范罢在大班任内最重大的业绩,就是策划并参与荷兰派往清廷的使团。该团紧接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之后,受到乾隆皇帝的同等礼遇,成为18世纪末中西关系的一件大事。

范罢是一个善于抓住机遇的精明“红毛”,当他从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获悉北京将有庆祝乾隆登位六十年的盛典,即向巴达维亚的荷印总督建议派遣贺正使,谋求对华

贸易的新权益,挽救荷兰帝国在东方颓势。此议被采纳,一个以德胜为正使、范罢为副使的荷兰使团便组建起来了。

该团于1794年8月15日乘“暹罗”号自巴达维亚起航,经澳门来广州。两广总督杨嗣昌在海幢寺接见使团,验看国书。随后,使团一行27人自广州乘船赴北京。

1795年1月12日谒见乾隆皇帝,行三跪九叩礼,出席紫光阁宴。1月31日瞻仰万寿山。2月8日在圆明园向乾隆皇帝辞行,接受“特颁敕谕”。5月9日荷兰使团返抵广州。

德胜使团的外交活动,是按清廷“朝贡”体制进行的。他们携带的致贺礼品,以西洋奇器为主,也包括若干南海名产,据梁廷枏《粤道贡国说》记载,使团携带了以下贡品——贡使至京,恭进:万年如意八音乐钟一对,时表极喜各式金表四对,镶嵌金小盒一对,镶嵌板四对,珊瑚珠一百八颗,琥珀珠一百八颗,千里镜二枝,风枪一对,金银钱三十斤,琥珀四十斤,各式花毡十版(即



从集义行(荷兰馆)顶楼眺望珠江

04 在广州订制中国式楼阁运回荷兰

清代广州的“舶市”,是异质文化的民族之间的经济交往,具有跨文化贸易的独特性质。荷兰馆作为一个著名的“红毛”商馆,在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上起到了独特的作用。

18世纪在欧洲风行一时的“中国热”,尽管是多渠道、多层次形成的,但广州荷兰馆曾经起过推波助澜,是一个明显的事实,饮茶风尚的传播

不必细说,仅就园林艺术的建构而言,也不难看出荷兰馆的中介作用。现代荷兰历史学家包乐史写道:

1760年,第一个庭院在荷兰建成,但这个所谓的“中英园林”结合了中国和荷兰的园林传统,富有曲折的景色布局,令人目瞪口呆:有一座小桥,一个山洞,一座中国式庙宇,一座凉亭,一架吊桥,甚至还有一片哥特式建筑的

05 贾宝玉手中的荷兰金表

至于广州荷兰馆如何将西洋物种引进中国,我们仅就其中可以确考者举出几件说说——

1. 时表 在乾隆时代,计时表是中国人极其罕见的西洋奇珍。难怪张九铨的诗称之为“百宝表”,前述曾七如在荷兰馆曾将他所看到的计时表描述为“小自鸣表持之耳畔,如囊虫之啄木”,令人如闻其声。范罢献给乾隆皇帝的礼品,内有“时刻报喜各式金表四对”,当属同类之物。

乾隆末年四川举人张问安《夏日在广州戏作洋船杂诗六首》之四句:“机轮历落动天倪,彩佩缤纷带齐。比似红毛好官样,半圭花影佛兰西。”意思是说华丽的荷兰船输入珍稀的荷兰货。

他还在诗下加注说:“洋表有红毛、佛兰西二种。红毛多度金壳,佛兰西多银壳。银壳以大扁为贵。”这表,据荷方档案,1782年即乾隆四十七年担任大班职务的是海里根多普,那么,在馆内宴请曾七如并赞赏他善饮的那个“白面碧瞳者”,既然“最贵”想必就是此人了。

2. 千里镜 千里镜即望远镜,是荷兰馆内一项重要的装备。这种西洋奇器,明末传入中国,清初文人对其构造和性能已有具体记述。李渔在顺治十五年(1658)成书的《十二楼》中,那篇《夏宜楼》书生醒语与詹小楼的那段,即以望远镜作为带至情节的重要物件:

此镜用大小数管,粗细不一。细者纳于粗者之中,欲使其可放可收,随伸随缩。所谓千里镜者,即在于管之两头,取以视远,无碍不到。“千里”二字虽属过称,未必果能由吴视越,坐秦观楚,然试于千里之内,便自不啻其视。至于十数里之中,千步之外,取以观人鉴物,不但不觉其远,较对面相视更觉分明。真可宝也。

访问过荷兰馆的人,对此宝物当然不会忽略,故乐钧诗云:“楼窗悬镜望重洋。”曾七如也特叙一笔:“有千里镜,可以登高望远,二三里能鉴人眉目。”

在乾隆时代的广州,能使用千里镜并形成吟咏者,只有富商显宦。十三行总商潘有度在《西洋杂咏》第十二首,说的是用千里镜观

十幅),各式羽缎十版,各式大呢十版,西洋布十匹,地毯二张,大玻璃镜一对,花玻璃壁镜一对,玻璃挂镜四对,燕窝一百斤,檀香五百斤,豆蔻一百斤,丁香二百斤,檀香油三十瓶,丁香油三十瓶。

清廷的回赠礼品,分“照赏”(按康熙赏例)和“加赏”两类,有玉如意、御笔“福”字以及龙缎等。另外,范罢以“副使大班”的身分,在万寿山和圆明园均受“加赏”,有锦缎、瓷器及茶叶、荷包等,“荷包”是绣花的布制佩囊,圆形或鸡心形,男人挂在腰带左右的吉祥物。

荷兰使团的北京之行,未能在通商方面取得预期进展。清廷仍将荷兰方面的致贺当作“慕化”,仍以居高临下的态度接待使团。

荷兰使团的活动结束后,范罢即卸除在广州荷兰馆的大班职务,赴美定居费城,用法文书写的出使实录——《1794至179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节谒见中国皇帝纪实》,并将这本巨著奉献给乔治·华盛顿,借以表达一名美籍荷裔意。

在18世纪的中西关系史上,范罢的著作与英国马嘎尔尼随员斯当东所写的《英使谒见乾隆纪实》,堪称使华外交实录的双璧。他们站在西方立场上,根据直接观察,揭示乾隆时代大清帝国的虚弱,异曲同工地对“天朝”盛世发出了危言。

范罢写道:“这个民族有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。他们可以放弃一切人为的需要,而我们如无法满足这些需要便会痛苦不堪。你认为中国人见到了每年来自欧洲的技术操作就会醒悟过来?这些珍品都被他们看成是多余的事。”

废墟。荷兰最引人注目的这类中西合璧的园林无疑是巴伦的“中国园林”,这是179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商务官员赫利堡建造的。在这座现在已不复存在的园林里,在假山和池塘中有两座用红、紫、白等颜色油漆的中国式楼阁,分别被命名为北京阁和广州阁。这两座楼阁是在广州预先订制后,再用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分散运到荷兰。

看月亮,写得有声有色: “万顷琉璃玉宇宽,镜澄千里幻中看。朦胧夜半炊烟起,可是人家灶火寒。”

他还加了一段自注:“千里镜,最大者阔一尺长一丈,倚有小镜看月,照见月光约大数丈,形如圆球,周身明彻,有鱼鳞光。内有黑影,似山河倒影,不能一目了然,惟向月中东西南北分看。久视则热气射目(反射刺眼)。夜静,有人用大千里镜照见月中烟起,如炊烟。”

另一位是两广总督阮元,他于嘉庆二十五年(1820)在广州作《望远镜中望月歌》,且述且叹,浮想联翩。诗中写道: “邹衍善谈且勿空,吾有五尺窥天筒。能见月光深洁白,能见日光不射红。见月似寻常小,能见如波高如嵩。许多泡影生镜边,大珠小珠光皎皎。”

阮元借助“五尺窥天筒”,抒发了一番“天问”式的感慨。在他们的诗中,西洋物质文明激发出对华夏月亮神话的新理解。“千里镜”不仅在视野上而且在精神上,已经把清代中国人带进新的境界了。

3. 短狗 曾七如游荷兰馆时见到的“短狗”,即哈巴狗,是洋人的宠物。清道人《听雨轩笔记》也有记述:

予于广东十三行见洋犬数对,状如巨猫,与常犬初生者无异,色为黑、白、苍褐三种,摇头点头,性甚驯扰,每对值番钱二三十。

道光十四年(1834)初,广州街头曾贴出一份洋人寻洋狗的赏格,令人叹为观止: 本年正月初十日,瑞行与荷兰馆走失洋狗各一只,迄今未回。其一长耳长尾,胸前配有褐色星号,身呈“香墨”色。另一为小狗,耳尖短剪,其尾不长,全身呈杂棕白色。大狗名“罗弗”,小狗名“博普”。特此告知。如有“仁人君子”知其下落(或许它们是“迷路”了)而报知者,即赏花红银大者二大洋,小者一大洋。即使被盗去(难以相信之事!)如其带回瑞行二号,仍将照付花红,不予追究。此帖是实,决不食言。

从这一则洋人的寻狗启事,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的差异。

4. 荷兰豆 荷兰馆与荷兰豆的关系,也是一段值得回味的佳话。

清朝嘉庆年间,广东阳春人刘世馨在其所著的《粤屑》中写道:

荷兰豆,本外洋种,粤中向无有也。乾隆五十年,番船携其豆仁至十三行,分与土人种之,九月重阳前后播种,苗高二三尺,叶翠,花白,正月时结豆,甘脆异常。初惟西关一老圃能得蒔植之法,每年八月初,以小提篮携豆上街,人争买之。初出甚贵,今则遍岭海皆有之。余前乞养居家,辟园种半亩以资供养。豆种自荷兰国来,故因以为名云。

据来自荷兰的资料显示,乾隆五十年(1785)抵粤荷船共四艘,其中直接来自阿姆斯特丹的两艘是Voorschoten号和Pol-lux号,携来豆仁的“番船”当为其中之一。另外,当年驻广州荷兰馆的大班是金绥斯,此人自1759年(乾隆二十四年)起即在馆内供职,是广州洋场上一名老“红毛”,人地皆熟,可能就是他将豆仁“分与土人种之”。于是,“西关”便成了荷兰豆的“西来初地”了。

点滴 小青

故宫博物院前院长、故宫学院院长单霁翔:故宫从来不缺观众,但是细细想他们真是观众吗?很多人进了故宫博物院,都跟着导游的小旗,盲目往前走,各宫殿再一看,就走出去了。实际上他们只是“到此一游”。

■好剧不费遥控器:判断一部电视剧成色高下或不受待见,有一个办法就是关注一下看电视的人如何对待手中的遥控器。倘若看电视的人不时触动按键,在不同的频道间频繁转换,那就不要指望这部电视剧能好到哪里去。

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表示:中国的货币政策应保持定力,坚决不搞“大水漫灌”。

■9月24日,贵州茅台收盘市值接近1.49万亿元,超过2018年贵州省生产总值(GDP)。

■江西省将从2021年1月1日零时起,对鄱阳湖全面禁止天然渔业资源生产性捕捞,禁捕期暂定10年。

■身着蓝色制服的森林消防队员正在值勤,妈妈和姥姥突然出现在面前。因为有纪律要求,这位小伙子依然站得笔直,泪水却夺眶而出。他对妈妈说:“妈,帮我擦下眼泪吧?”这段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播出后,网友纷纷点赞节假日依然坚守岗位的消防员。

■据印度媒体报道,2014年印度手机制造厂仅有两家,2019年印度手机及零部件制造厂达到268家。印度手机和电子协会主席潘卡吉·莫辛德日前表示:“在过去4年,印度在手机和零部件制造方面取得巨大成功,目前印度国内销售的95%以上的手机都是在印度国内生产的。”有媒体认为,手机制造已成为印度制造的明星产业。印度已是世界上

■日本创业公司ALE研发的一颗名为“ALE-1”的“人造流星”卫星今年升空,预计明年春天可带来首场“人造流星雨”。该卫星能够携带约400个直径约1厘米、重数克的金属小球,在轨道上一次释放5至20个,它们高速进入大气层时会燃烧,形成与自然流星雨一样的效果,而且亮度更高——在城市里也能实现“肉眼可见”。

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大手机制造国。

■为降低垃圾处理成本,澳大利亚墨尔本女子中学计划禁用垃圾筒,并告知该校的1300名学生须将垃圾带回家。校长莫尼表示,谁产生的垃圾,就得谁负责清理。2018年,墨尔本女子中学花费近1.3万澳元处理1000立方米的垃圾。

■1984年,美国伯克利大学心理学家菲利普·泰特洛克做了一个影响深远的研究。他调查了284个专门以预测政治、经济趋势为职业的政治学家、智囊团和外交官,向他们提出各种预测问题,比如戈尔巴乔夫有没有可能因政变而下台等。

这个研究做了20年,一直等到当年预测的事情全部水落石出。2003年,泰特洛克总结了这些专家给出的答案,发现专家预测的准确率还比不上直接掷骰子。更具讽刺意味的是,这些专家对自己专业领域的预测得分居然比专业外的领域更差。

泰特洛克根据这项研究写出的《专家的政治判断》书,最后得出的结论是:我们还是自己思考算了。尽管他的研究显示,专家的得分其实还是比普通路人略高一点儿。

■你手机的计算能力超乎想象,已经超越了NASA(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)1969年拥有的那些计算能力的总和。NASA用那些计算能力发射人上了月球,而你用更强的计算能力发射愤怒的小鸟去砸猪。